

知世书坊·第一辑（共八本）

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

知世书坊·第一辑（共八本）

作者：【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约翰·米尔斯海默，阿齐兹·拉纳，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塞缪尔·P·亨廷顿，米尔斯海默，兰德尔·施韦勒，辛西娅·恩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总目录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德陷阱吗？](#)

[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美国自由的两面性](#)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大国政治的悲剧](#)

[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

[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第二版](#)

版权信息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ISBN 978-7-208-15487-2

I.①注... II.①格.....②陈.....③傅... III.①中美关系研究 IV.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6502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封面设计 周伟伟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

陈定定 傅 强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4

字 数 267, 000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2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208-15487-2/D·3295

定 价 78.00元

目录

[版权信息](#)

[本书赞誉](#)

[推荐序 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前言](#)

[致谢](#)

[引言](#)

[第一部分 中国的崛起](#)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第二部分 历史的教训](#)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第三章 过去五百年](#)

[第四章 英国与德国](#)

[第三部分 暴风前夕](#)

[第五章 想象一下中国和我们一样](#)

[第六章 中国想要什么？](#)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第八章 走向战争](#)

[第四部分 为什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第九章 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结论](#)

[附录1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

[附录2 七个“稻草人”](#)

本书赞誉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一个对世界秩序的重大挑战，即崛起国对于守成国的影响。我饶有兴趣地读了这本书，我希望中美关系成为和平解决自身问题的第五个案例，而不是导致战争的第十三个案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格雷厄姆·艾利森用他一贯的清晰概念，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照亮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主题：主导国家（美国）怎样避免与崛起国家（中国）陷入战争？艾利森提供了历史的视角，同时也展示了他从内部了解的美国视角，以及他非同寻常的中国视角。

——《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Ezra Vogel）

阅读《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并从中吸取教训有助于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创始人和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中美两国想要战争么？不。它们可能会因为严重的结构性压力而被迫产生冲突么？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艾利森绘制了可以避免直接冲突的基本线路。《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所要探讨的问题将会被研究和辩论几十年。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

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当代国家安全领域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也是应用历史学大师。你可以打赌中国的领导人会读到艾利森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警告。我只希望我们对美国的领导人能有同样的把握。每个知情的公民都应该买一本。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世界战争》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我们需要去研究书中的论点。灵活的描述、清晰的架构，以及对强大的力量和偶然事件之间无休止的历史辩论的细致总结和探索，使《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本身就会获得更多关注、辩论和持续的课堂讨论。

——《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

格雷厄姆·艾利森是最敏锐的国际事务观察家之一。他一直将他对历史潮流的深刻理解带到如今最困难的挑战中去，并使我们最棘手的外交政策难题能够被专家和普通公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时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艾利森阐述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挑战——处理中美之间的关键关系。

——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世界上最重要关系——美国和中国——的最深刻、最发人深省的著作之一。如果格雷厄姆·艾利森是正确的——我认为他是正确的——中美两国必须吸取这一出色研究中的教训，以便建立一种战略关系，避免爆发一场双方都不会获胜的战争。

——KKR全球学会主席、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

美国能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问题。这本重要而有趣的书为我们如何避免这样的冲突提供了教训。

——《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艾利森再次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通过对昨天战争的深刻回顾和对当今国际政治的深刻理解，艾利森不仅向美国和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关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会产生的后果的警告，而且提出了关于避免这一问题的洞见。对于太平洋两岸的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民来说，《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都是必读的著作。

——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

艾利森从戏剧和历史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他的书应该会引起美国思想家的警觉……或许会让我们从“通俄门”、总统推特中转移注意力，如果你想读到最严肃的战略设想，请特别关注最后十页的内容。这本书值得一读。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密码简报》，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

这是一本非常有智慧和重要的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全球定位系统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

这是今夏华盛顿和北京都必读的一本书。

——《波士顿环球报》，尼尔·弗格森

读这本书会让你感到不安，艾利森是一位一流的学者，他具有一流政治家的直觉。他赋予修昔底德陷阱以深刻的历史、地缘政治和军事的意义。与其他学者不同，他写得很有趣。艾利森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他指出娴熟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敏感性可以使这两个超级大国避免战争。

——彭博社新闻（Bloomberg News）

这是一本简短但影响深远的书，敏锐地剖析了这段历史……艾利森说，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进行谈判来保持长期和平，进而避免战争。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推荐序 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当前的中美关系处于敏感时期。有人认为双边关系已经跌落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谷，甚至还会继续跌落。更消极的观点认为——“中美注定一战”，这便是本书的标题。在书中，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比喻中美关系的未来命运。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宗明义地提出，“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竞争与冲突的必然性，即国家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将引发战争。艾利森教授看到，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实力的上升势必挑战处在霸权地位的美国；从历史的镜像中，他描绘出中美两国间国家利益、恐惧和荣誉的交织与对抗，提出“注定一战”这一悲剧性推论。

这几年，借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关系困境的言论越来越多。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的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在专访中，针对中国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主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1]

在世界舆论就“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艾利森教授在2015年9月的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杂志上发表长文《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2]，又于2017年5月在美国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在2015年长文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和澄清，回应了对他的若干批评。

对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论断作出批评并不困难。比如，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没有争霸的基因；艾利森等美国学者不了解中国，不应该用西方国际关系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对外行为；艾利森关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研究，所举出的历史样本不够丰富，得出的结论过于武断；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都太重要了，用战争来解决中美矛盾两败俱伤，两国的理性决策者绝对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3]冷战时期的美国同苏联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建立了危机管控机制，而中美之间现在也已建立起类似机制，可以避免偶发冲突激化为战争。

自2014年以来，驳斥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比喻中美关系的文章和议论已经很多了。但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自2009年以来，特别是2016年底以来，中美关系的确是在逐渐滑坡。2017年底和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提出“印太地区”概念，加强地区安全同盟，这些都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

2018年春天，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发展为贸易战，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层层加码，逼迫中方采取反制措施。中美经贸关系过去被形容为“压舱石”，现在却更像“绊脚石”。美国视南海争端为中国挑战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主要焦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也正在挑衅中国的底线。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向外部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选择”，被美方认为是西方价值体系、民主模式和美国世界霸权的强劲挑战。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关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对中国现行内外政策进行强烈抨击，威胁要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进一步坐实了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竞争的战略态势。

自艾利森明确作出“修昔底德陷阱”论断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地缘战略竞争、政治分歧和战略互疑的深化，至少证明他的论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被轻易驳倒。有些中国评论甚至承认，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4]一般中国读者都知道，中美两国实力对比朝中国方面偏移，是中美矛盾加剧的原因。但是，本书并没有将视角停留在这种所谓“政治现实主义”之上，而是借用美国已故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强调中美两国在文化价值观、发展道路、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也是使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我认为，本书第三部分的相关论述，是相当精彩、耐人寻味的。

在本书附录2“七个‘稻草人’”中，艾利森指出，学术辩论的一个通行做法，是把对方的论点扎成一个“稻草人”（对曲解对方论点的比喻），把它点火烧掉，然后声称驳倒了对方。他说的第一个“稻草人”，就是本书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的。艾利森辩解称，他在书中列举了一些案例，说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可以避免战争；即使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谓“不可避免”，也含有夸张意味。那么，为什么本书要以“注定一战”为书名呢？艾利森在一次跟我的私下交谈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美国也有“标题党”，出版社编辑故意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眼球。其实，它那个带问号的副标题更符合作者的初衷。

无论如何，中美是否终将发生战争或其他形式的全面冲突对抗，是一个真实的命题，无法给出简单的答案。我认为，只有中美两国提出新的战略思路 and 作出重大政策调整，才能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否则，今后的中美关系将难以逆转地继续滑坡，并形成长期对抗。战争是最坏的、非理性的结局，应当全力避免；但即使没有战争，两国一旦发生政治外交摩擦加剧、军备竞赛升级、局部军事对抗出现、经济合作脱钩、社会交往减少、科技教育交流倒退的现象，也会严重影响两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福祉。

理解中美关系，除了要深入了解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动态之外，还需要关注中美建交40年来世界政治的变化。《三国演义》的卷首语写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或许也可以用来描述当今的世界政治。冷战结束后，天下大势曾经以“合”为主流，然而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漩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难以逆转的；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社会认同的割裂将世界政治推向分化，形成反全球化的逆流。经济不平等沿着社会认同的断层线加剧，构成了世界政治新阶段的特征。

世界政治的新变化或许是20世纪晚期开始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中的一段间奏，但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新时代的序曲。这将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背景和底色。更大的阴霾可能笼罩中美关系，两国的发展方向也有分道扬镳的危险。这是同全球化大潮中的逆流相对应的，并非不可想象。

警惕并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值得中美两国有关人士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因此，把这本著作带给中国读者是必要的，中国学者对“修昔底德陷阱”理应有自己的解读和回应。陈定定教授和傅强刚教授的工作给中国的中美关系研究添薪加火，应当向他们致谢。

王缉思

2018年霜降时节写于北京大学北园

前言

两个世纪前，拿破仑曾警告世人：“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今天中国已经觉醒，而世界正为之颤抖。

然而，许多美国人至今仍然否认中国从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到“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对美国所产生的影响。这本书最大的创意是什么？它都浓缩在一个词中——修昔底德陷阱。当崛起国威胁要取代守成国地位时，就应该鸣起警钟——危险迫近。中国和美国目前冲突丛生，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边缘——除非双方采取艰难且痛苦的行动来避免战争。

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优势受到了挑战，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掉入一个致命的陷阱中，这个陷阱最先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定义。他曾撰书记叙了2500年前一场几近毁灭了古希腊两大城邦的战争，在书中，他这样解释：“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5]

这一重要的洞见描述了一种危险的历史模式。我在哈佛大学领导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回顾了过去500年的历史，发现了16个案例，都是一个大国崛起搅乱了另一个主导国的地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一个世纪以前，工业化后的德国挑战了英国在啄食顺序^[6]中的顶端地位。它们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需要用一种新的暴力冲突类型来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研究发现，这16个案例里有12个案例都以战争收场，只有4个得以幸免——对于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博弈来说，这个比例难以让人欣慰。

本书并不是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而是聚焦于崛起中的中国对于美国以及全球秩序的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以来，华盛顿所主导的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已经定义了世界秩序，并造就了一个大国间无战争的时代。现在大多数人视之为一件正常的事情。历史学家称这是一种罕见的“长和平”。现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瓦解这一秩序，故而此时提出和平时代是否终结是很自然的事。

2015年，我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在该文中，我论证了这一历史隐喻，为看清当今中美关系提供了绝佳的视角。从那时起，这个概念就引发了诸多争论。政策专家和领导人们没有直面现实证据，反思并作出可能令双方感到不适但实属必要的调整，而是围绕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必然性”的说法建构了一个“稻草人”。他们以此为基础，争辩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战争并非注定的。在2015年举行的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详细讨论了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强调，虽然中国崛起带来了结构性压力，但“两国都有能力解决分歧”。同时，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他们也承认，“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赞同这一观点：中美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修昔底德也会赞同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本可以没有战争这一观点。从他的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说的“不可避免”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目的是强调该论断。修昔底德陷阱既不是宿命论，又不是悲观主义。相反，它让我们超越了新闻头条和政府的言辞，认识到北京和华盛顿必须妥善处理结构性压力，以此构建和平的双边关系。

如果好莱坞正在拍摄一部针对中美两国迈向战争边缘的电影，那么再也找不到比习近平和唐纳德·特朗普更好的主角了。这两个人都体现出了各自国家对于实现国家振兴的深切渴望。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国领导人，凸显了中国的崛起国角色，而用言语中伤中国的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胜利显示了守成国的有力回应。习近平和特朗普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但作为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们又有着相似之处。他们：

- 都被一个共同的抱负所驱使：让国家再次伟大。
- 都把另一个国家视为实现梦想的主要竞争对象。
- 都为自己独特的领导能力而自豪。
- 都认为自己在振兴各自国家的事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 都已经宣布了艰巨的国内议程，要求进行根本性变革。
- 都支持国内彻底根除腐败的计划，并直面对方尝试采取的手段，以达到各自的目标。

这两个大国之间即将发生的冲突会导致战争吗？中国和美国会步雅典和斯巴达、英国和德国的后尘，使悲剧重演吗？抑或他们会找到一种有效避免战争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是会像一个世纪以前的英美两国一样，还是会像美国和苏联历经的40余载的冷战一般呢？显然，我们无从得知。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未来几年中，我们所熟知的修昔底德状态在两国间将会愈发紧张。

否认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削弱其真实性。承认它也不意味着要欣然接受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为了后世子孙，直面这一历史上最残酷的趋势之一，然后竭尽所能迎难而上。

致谢

本书成书过程漫长，而且费尽心力，如同一场智识上的奥德赛之旅。一路走来，欠下的感激就够写一篇长文了。从成为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一年级新生，拉班（Laban）教授向我（初次）介绍修昔底德，到如今在哈佛大学每月都会见面的中国工作组，我每天都在学习贯穿于本书的分析方法。我的资深论文导师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革命的剖析》的作者）教我认识历史中的模式。在牛津大学学习分析哲学时，我从A.J.艾尔（A.J. Ayer）、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和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那里学到了概念框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作为一名哈佛大学的博士生，我拥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获得三位善用历史来分析当下挑战的学界泰斗的指导，他们分别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欧内斯特·梅和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我的博士论文考察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阐明政府决策的复杂性，以及超级大国核武库所构成的特殊危险，这些核武库在对手之间焊接了牢不可破的纽带。

在冷战期间，我有机会学习和帮助人们理解这一切存在的威胁，并作为顾问、导师和参与者制定战略并最终打败“邪恶帝国”。我有幸为这些人工作过：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温伯格（Weinberger）（我担任特别顾问）、比尔·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彭（Les Aspen），以及比尔·佩里（Bill Perry）（我担任助理国防部长），从温伯格到阿什·卡特（Ash Carter）（我曾为其国防政策委员会服务）的12位国防部长，从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特纳（Stan Turner）（我曾担任特别顾问）到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以及更多的同事。

但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尤其是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在总体上滋养和塑造了我的思想，特别是这本书中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有幸担任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阿尔·卡恩塞尔（Al Carnesale）、小约瑟夫·奈（Joe Nye）和我领导了“避免核战争”的项目，招募了大量的初级教员和博士后，试图了解如何充分限制核竞赛，使致命的对手得以生存。在后冷战时代，我曾担任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负责人，在那里许多教职员和同事们向我传授了有关国际事务中最重大挑战的知识。自始至终，我都有幸参与到A.N.怀特黑德（A.N. Whitehead）所说的“年轻人和年长的人在富有想象力的学习追求中走到了一起”的项目中。

我继续从贝尔弗中心中国工作组那里有关中国的教程中受益。工作组成员包括霍斯·卡特莱特（Hoss Cartwright）、欧立德（Mark Elliott）、傅泰林（Taylor Fravel）、凯利·西姆斯·加拉格尔（Kelly Sims Gallagher）、保罗·希尔（Paul Heer）、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柯伟林（William Kirby）、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梅根·沙利文（Meghan O'Sullivan）、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芮效俭（Staple-ton Roy）、陆克文（Kevin Rudd）、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傅高义（Ezra Vogel）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为了能透彻理解中国经济，马丁·费尔德斯斯坦（Martin Feldstein）一直给予我耐心的帮助，是我的主要领路人，同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人也给予了支持。在运用历史进行分析时，与我共同发起哈佛应用历史项目的尼尔·弗格森一直贡献巨大（most valued），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弗雷德里克·洛格瓦（Fredrick Logevall）、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和斯蒂芬·范·埃弗拉都提出了充满智慧的建议。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写书是一种冒险。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玩物和消遣方式。然后它变成了情人，再变成主人，接着成为暴君。最后一个阶段是，就在你即将接受它奴役的时候，终于杀死了怪物并将它示众。”

与我之前的书不同，很多人帮助我杀死了这个怪物。主编乔希·布瑞克（Josh Burek）一直是我灵感、洞察力和奋斗到底决心的源泉。他的得力干将亚当·西格尔（Adam Siegel），在管理研究助理和学生的过程中展现了坚持不懈的优秀精神和过硬的技能，研究助理和学生包括：杰恩·贝克（Jean Baek）、利奥·本科林（Leore Ben-Chorin）、埃德尔·迪克斯坦（Edyt Dickstein）、克里斯·法利（Chris Farley）、保罗·弗莱奥利（Paul Fraioli）、埃莉诺·弗莱奥利（Eleanor Freund）、埃克·弗莱曼（Eyck Freymann）、乔什·戈德斯坦（Josh Goldstein）、苔丝·海尔格伦（Tess Hellgren）、阿琼·卡普尔（Arjun Kapur）、扎卡里·凯克（Zachary Keck）、内森·列文（Nathan Levine）、韦斯利·摩根（Wesley Morgan）、威廉·奥索夫（William Ossoff）、克里安娜·帕帕达基斯（Krysianra Papadakis）、萨姆·拉特纳（Sam Ratner）、亨利·罗马（Henry Rome）、蒂姆·桑多尔（Tim Sandole）和赖特·史密斯（Wright Smith）。特别感谢约翰·马斯科（John Masko），他在附录1中大胆地编辑了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的初稿。两位杰出的学术新秀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罗德（Ben Rhode），他帮助我打开了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门；还有赛斯·贾菲（Seth Jaffe），他熟练地评估了修昔底德陷阱在古希腊的原始实例。

鲍勃·布莱克威尔（Bob Blackwill）、尤里·弗里德曼（Uri Friedman）、迈克尔·玛蒂娜（Michael Martina）、吉姆·米勒（Jim Miller）、小约瑟夫·奈、麦克·萨梅耶（Michael Sulmeyer）、马克·托赫（Mark Toher）、文安立（Odd Arne Westad）、阿里·温尼（Ali Wyne）和鲍勃·佐利克（Bob Zoellick）重读了本书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以上值得尊敬的团队成员为这本书的修正和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反馈意见。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错误，都应由我本人负责。

贝尔弗中心的执行董事加里·萨莫雷（Gary Samore）和帕蒂·沃尔什（Patty Walsh）都极其优秀，因为他们的努力工作使中心在我撰写此书过程中一切运行正常。我的同事本·克雷格（Benn Craig）、阿里尔·德沃金（Arielle Dworkin）、安德鲁·法西尼（Andrew Facini）、安德里亚·海勒（Andrea Heller）、亨利·坎普夫（Henry Kampff）、西蒙娜·奥汉伦（Simone O'Hanlon）和莎伦·威尔克（Sharon Wilke）都在幕后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谢谢你们。

感谢我的经纪人，迈克尔·卡莱尔（Michael Carlisle），他很早就看到本书的潜力，且从未动摇。霍顿·米夫林·哈考特（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团队在管理我的手稿和处理我的情绪波动方面值得赞许，该团队的成员有：拉里·库珀（Larry Cooper）、洛里·格拉泽（Lori Glazer）、卡拉·格雷（Carla Gray）、本·海曼（Ben Hyman）、亚历山大·利特尔菲尔德（Alexander Littlefield）、艾莎·米尔扎（Ayesha Mirza）、布鲁斯·尼科尔斯（Bruce Nichols）、塔林·罗德（Taryn Roeder）。

最重要的是，我很感激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她不仅是我一生的挚爱，而且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回顾本书每一个章节时最体贴的现实检验者。

引言

我之所以著此书，并非为了给自己赢得一时的赞誉，而是想以此作为留给时代的财富。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我们处于世界之巅。我们已经登顶，并将永葆辉煌。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叫作历史。然而这种历史对他人来说却并不愉快。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回顾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钻禧庆典”

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经常被问及“历史的教训”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没有永久的赢家和败者。

——拉玛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

“哎，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这是德国总理可以想到的最好的主意了。即使当一位同僚逼问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时，他也无法解释他的选择，更无法解释其他欧洲政治家们的选择是如何诱发了迄今为止最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参战国都失去了它们为之斗争的一切：奥匈帝国解体，德国皇帝被罢黜，俄国沙皇被推翻，整整一代法国人为之流血牺牲，而英国也失去了它的财富和朝气蓬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

近半个世纪以来，贝特曼·霍尔韦格的惋惜一直萦绕在美国总统的心头。1962年，时年45岁的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正值总统的第二年任期，但他仍然尽力履行自己作为总司令的职责。他知道当他按下核武器按钮的时候，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杀死数亿人。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当时曾有一句标语称：“宁肯死去也不被赤化。”肯尼迪拒绝了这种过于简单且错误的两分法。“我们的目标”，正如他所言，必须是“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和平，是和平和自由兼得”。问题是，他和其领导的政府如何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1962年夏天，和家人在科德角（Cape Cod）度假时，肯尼迪阅读了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关于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八月的枪声》（The Guns of August）。塔奇曼追踪了德皇威廉二世及其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及其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以及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认为他们如同在深渊中梦游。塔奇曼认为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危险。没人想要最后的这场战争。若能从头再来，没有人会重蹈覆辙。因此在反思自己的责任时，肯尼迪发誓如果自己面临灾难性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抉择，而且自己的选择至关重要时，他会给出比贝特曼·霍尔韦格更好的答案。

肯尼迪并不能预见未来。1962年10月，在他阅读塔奇曼著作的两个月后，他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对抗。古巴导弹危机始于美国发现苏联企图将核弹头偷运到古巴，该地距佛罗里达州仅有90英里。从外交威胁到美国直接封锁古巴，美苏两国之间都开始了军事动员并出现了几次高风险的冲突，包括美国U2间谍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等，两国间紧张局势迅速升级。在危机持续了13天的危急时刻，肯尼迪向他的胞弟罗伯特透露，他相信这场危机最终演化成核战争的概率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但是，迄今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找到降低战争概率的方法。

虽然肯尼迪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但他还是重蹈覆辙，作出他知道的实际上会增加战争风险（包括增加核战争风险）的选择。他选择了公开对抗赫鲁晓夫（而不是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私下解决这一事件），并且画下了一条明确的红线，要求拆除苏联的导弹（而不是给自己留有余地）；威胁进行空袭，摧毁苏联导弹（知道这可能引发苏联对柏林的报复）；最后，在危机的倒数第二天，肯尼迪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时限和最后通牒（即如果苏联拒绝该通牒，肯尼迪将要求美国打响战争的第一枪）。

在作出每一个选择的时候，肯尼迪都明白，他正在加剧危险，未来发生的事件和他人作出的选择可能超出他的控制范围，这可能会导致核弹摧毁包括华盛顿特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家人的避难所）在内的美国城市。例如，肯尼迪将美国核武器战备状态提高至二级战备状态，使得美国不易受到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同时也拉下了许多核武器的保险栓。在二级战备状态期间，德国和土耳其的飞行员驾驶着装载了核武器的北约武装轰炸机，距苏联的目标不到两个小时。因为核武器的电子锁在当时尚未发明，所以没有任何物理或是技术层面的障碍能够阻止一个决心前往莫斯科并投下核弹的飞行员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没有办法能够远离这些“无法控制的风险”，肯尼迪和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深入研究组织程序，力求减少事故或疏漏。尽管他们已经作出努力，历史学家仍然发现了数十个在肯尼迪控制范围之外且几乎可以诱发战争的事件。例如，在一次美国的反潜行动中，美军在苏联潜艇周围投放炸药，迫使苏联潜艇浮出水面，这使得苏联舰队的指挥官认为遭到了攻击，差点发射了核武装鱼雷。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个U2间谍飞机的飞行员误从苏联上空飞过，导致赫鲁晓夫担心美国正在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评估并提取坐标。如果上述任意一个行动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尼迪能够解释他的选择是怎样导致战争的？在面对质询时，他能给出比贝特曼·霍尔韦格更好的答案吗？

人类事务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困扰着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直接或者最直接的原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的暗杀行动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调动军队对抗轴心国的决定。如果古巴导弹危机导致了战争，那么直接原因是苏联潜艇的长官决定发射鱼雷而不是让潜艇下沉，或者是某个土耳其飞行员错误地将核武器投放在莫斯科。毋庸置疑，这些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非常重要。但是史学创立者们认为，导致流血冲突的最明显原因往往掩盖了更为重要的因素。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比战争导火索更为重要的是奠定战争基础的结构因素；在这类条件下，可控事件将会逐步升级到无法预见的严重程度，并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修昔底德陷阱

对于这个国际关系研究中引用最频繁短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其阐释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修昔底德记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这场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冲突吞噬了他的家乡——雅典，并且几乎毁灭了整个古希腊文明。修昔底德曾作为士兵服役，他见证了雅典挑战当时占据希腊统治地位的军事政权——斯巴达。他观察了这两大城邦间爆发的武装冲突，并详细地描述了战争中可怕的伤亡人数。当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的斯巴达终结雅典之时，他却早已辞世，没能见证这场战争的惨痛结局，但这对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很多人指出了一系列促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因素，但修昔底德直接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当他把焦点集中在“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时，他发现了一些历史上最具有灾难性和最令人困惑的战争根源的主要驱动力。在不考虑动机时，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导致暴力冲突，无一例外。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更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几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战争。

像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雅典人认为它的进步是利大于弊的。在冲突爆发前的半个世纪里，雅典已经成为古希腊文明的灯塔。雅典拥有哲学、戏剧、建筑、民主、历史和骁勇的海军，以及以往普天之下见过的和没见过的任何东西。它的迅速发展开始对斯巴达产生了威胁，而斯巴达已经习惯了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主导地位。随着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膨胀，雅典人也随之要求自己被尊重，并期望调整安排以反映新的权力现实。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对地位变化的自然反应。雅典人怎么可能不认为他们的利益更值得被重视呢？雅典人怎么可能不期望他们在解决分歧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呢？

修昔底德也解释说，斯巴达人自然也应该认为雅典人的主张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忘恩负义的。斯巴达有权质问雅典，是谁给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安全的环境？随着雅典觉得自己的地位愈发重要，并认为自己应该拥有更多话语权时，斯巴达便心生恐惧和不安，并决心捍卫现状。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场景中也有所体现，甚至在家庭中都可以看到。当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平步青云，让人想到他将会盖过其兄长（甚至其父亲），我们预料会发

生什么呢？卧室、衣柜的空间或座位的分配是否应该进行调整以反映地位的变化和年岁的增长呢？在诸如大猩猩这类的有统治首领的物种中，一旦潜在的继任者越来越强大，无论是族群的头领还是其挑战者都作好了最终摊牌的准备。在商业领域，当颠覆性技术允许像苹果、谷歌或优步之类的新贵公司迅速闯入新的行业时，其结果往往是一场激烈的竞争，并导致该行业的老牌公司，例如惠普公司、微软或是出租车运营商去调整和适应它们的商业模式，或是导致老牌公司的消亡。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这一局面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为危险。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最初的实例导致了一场让古希腊为之战栗的战争一样，这一现象在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外交领域。今天，它更是已经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置于一场无人想要的、通往灾难的道路上，但最终它们可能会证明悲剧无法避免。

中美注定一战吗？

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变化。如果美国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它占据了全球经济市场的50%。到198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22%。而中国连续30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中的份额减少到了现在的16%。如果按照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在未来30年内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1%。同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并将在2040年达到30%。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逐步使之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者。在冷战期间，随着美国对苏联挑衅的反应愈发迟钝和笨拙，五角大楼曾有此言论：“如果我们面对一个真正的敌人，我们将深陷巨大的困境之中。”中国正是这样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潜在敌人。

中美两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这显然并非明智之举。然而，回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百年历程，历史证明人类会变得愚钝。当我们说战争“不可想象”时，这是一句关于这个世界上可能发生之事的陈述，还是仅仅是我们有限的思维能构想出来的事物呢？

就目前来看，关于全球秩序的决定性问题是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多数符合这一范式的竞争大多以悲剧收场。在过去的500年中，有16个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幸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则只是因为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在行动和态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

中美两国同样可以避免战争，但前提是这两个国家能够接受以下困难的现实。首先，就目前的态势而言，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发生战争不仅是有可能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比目前所认识到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就以往历史经验而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低估战争发生的危险反而会增加战争发生的风险。其次，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历史表明，主要的守成国可以在不引发战争的前提下，管理与对手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与那些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对手的关系。这些成功和失败的记录为当今政治家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正如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所言，只有那些没有学习历史的人才会被谴责重蹈覆辙。

接下来的章节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起源，探究其发展的动态过程，并解释它对于当前中美之间竞争关系的影响。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崛起的简要概述。每个人都都知道中国正在发展，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发展的规模或结果。用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话来说，这件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感到惊讶。

第二部分是从历史的广阔视角来解读中美关系的近期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的事件，而且还提供了事态发展趋势的线索。我们的研究将追溯到2500年前，当时雅典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占据主导地位军事强国——斯巴达，进而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还有，那些发生在过去500年间的重要案例也为我们理解崛起国和守成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战争提供了洞见。与当前中美僵局最接近的状况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这应当给我们以警醒。

第三部分将探讨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是否已经处于暴风雨前夕。我们看到大量媒体报道了中国的“强势”行为和不愿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年的人和事。同时，进行一定的自我反思和对照也是应当的。如果中国“像我们一样”——美国大步冲入20世纪，信心满满地认为接下来的百年将是美国的时代——那么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更加严峻，战争更难以避免。如果它真的沿着美国的脚印，我们应该能看到中国将影响力从蒙古扩展到澳大利亚，就像当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按照他的喜好塑造了“我们的半球”一样。

不过，中国现在走上了一条与当年美国登顶霸主时所采取的不同道路。但是，从中国崛起的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似之处。那么，中国想要什么？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再次伟大。十多亿中国人最深切的渴望不仅是使得国家富有，而且要实现国家的强大。事实上，他们的目标是中国足够富强以至于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中国利益并给予中国应该得到的尊重。这一“中国梦”的规模和雄心，足以让我们打消任何认为中国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后，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会自然消退的念头。当考虑到我的前同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时，这一点尤其如此。他指出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和传统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具有历史性隔阂，这使得两国间的和解更加难以捉摸。

虽然似乎很难看到目前两国间对抗会得以解决，但是两国发生实际武装冲突似乎也是遥不可及的事。但果真就是这样吗？事实上，通往战争的道路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多样，战争貌似更可能发生（甚至更为平淡和普通）。从当前中国南海、中国东海以及网络空间的对抗，到一场螺旋式上升并濒临失控的贸易冲突，中美两国间极易爆发双方直接交火的情况。尽管这些情景都不太可能发生，但当我们回忆起暗杀斐迪南大公或是赫鲁晓夫在古巴的核冒险的意外危机之后，我们意识到了“不太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小。

第四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大多数政策界和公众都对战争的可能性抱有天真的自信，而宿命论者则看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迅速逼近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不过，双方都不完全正确。如果两国领导人都能研究历史中成败的经验和教训，那么他们将找到丰富的线索，并能够从中形成一个在不发生战争的状态下满足各国基本利益的战略。

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5000年历史的文明重返辉煌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实现的条件，它需要经过一整代人努力管控而营造出长期环境。这种管控的成功不仅仅只需要新的口号、更频繁的首脑峰会或是更多的部门工作会议。要在不引发战争的情况下管理这种关系，就需要双方政府最高层时时刻刻地持续关注。这将需要两国之间高度的相互理解，而这种程度的相互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就中美重新建交事宜进行对话后就未曾见过。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领导人和公众需要在态度和行动上都作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愿意去思索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设想那些不可想象之事。中美之间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只能去改变历史的弧线。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知世书坊·第一辑（共八本）》格雷厄姆·艾利森 & 约翰·米尔斯海默 & 阿齐兹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125.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